

翟玉忠 著

斯

文 在 兹

中华文化的源与流

谨以此书献给南怀瑾先生。

多年来，南师怀瑾先生关心、支持新法家；而今，世上再无南师……

他留给我们一种大无畏、中立不倚的学术精神！他为我们支撑起了一种超越时空、生死的坚守！他告诉我们伟大的事业和生命是不朽的！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01403499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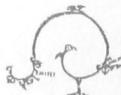
K203
289

斯文在兹

中华文化的源与流



翟玉忠著



 中央编译出版社
CCTP 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

北航

C1714583

K203
28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斯文在兹：中华文化的源与流 / 翟玉忠著 . —北京 : 中央编译出版社 , 2014.3
ISBN 978-7-5117-2059-7

I. ①斯… II. ①翟… III. ①中华文化－研究 IV. ① K2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22274 号

斯文在兹：中华文化的源与流

出版人：刘明清

出版统筹：董 巍

责任编辑：陈 肃 曲建文

责任印制：尹 璞

出版发行：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(100044)

电 话：(010) 52612345 (总编室) (010) 52612363 (编辑室)

(010) 52612316 (发行部) (010) 52612315 (网络销售)

(010) 52612346 (馆配部) (010) 66509618 (读者服务部)

传 真：(010) 66515838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瑞哲印刷厂

开 本：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：169 千字

印 张：14.25

版 次：2014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45.00 元

网 址：www.cctphome.com

邮 箱：cctp@cctphome.com

新浪微博：[@ 中央编译出版社](#)

微 信：中央编译出版社 (ID: cctphome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

凡有印装质量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。电话：010-66509618



将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物质文明有机结合起来（代序）

将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物质文明 有机结合起来

（代序）

观察我们周围的世界，几乎一切都是由西方文化，特别是西方物质文明塑造的——从头顶上的电灯到眼前的电脑，从我们的娱乐到我们的医疗，都是这样。那么，西方文明代表了人类进步的最高阶段还需要任何怀疑吗？

如果单纯从物质方面来衡量，西方文明目前的确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。问题是，人类文明除了物质方面，还有精神的、社会的、政治经济的诸多方面，现实世界中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。过去五百年来，特别是近一百多年来，西方物质文明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福祉的同时，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危险。

2013年9月14日，台湾《自由时报》报导说，由英美顶尖科学家组成、英国前皇家学会会长芮斯领导的“剑桥生存危机研究中心”（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xistential Risk，简称 CSER）列举了各种可能摧毁全世界、危及人类生存的灾难事件，包括：核战争、陨石撞地球、网络攻击、生物恐怖主义、食物短缺、流感肆虐、杀人电脑、气候剧变等等，而这一切皆源于人类自身。芮斯感叹：“影响人类永续生存的最大



威胁是人类本身。”^①

不难看出，物质文明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。它可以造福人类，也可以毁灭人类。人类需要一种更高的智慧去控制这把双刃剑，在笔者看来，这种智慧是单纯的西方文化所不能胜任的，需要汲取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。进而言之，就是要将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物质文明有机结合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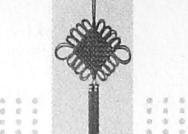
为何这么说呢？因为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，近代西方文明有太多不足之处——它的生活方式是违反人类本性的，它的世界观有严重的缺陷，它的逻辑体系有太大的局限性——而中华文化正好补这些不足。

一、人性的解放早已蜕变为物欲的放纵

先说生活方式。

文艺复兴以来，西方文化高举人性解放的大旗，将人类物质文明推向了极致。人们发现，人性的解放早已蜕变为物欲的放纵，20世纪兴起的消费主义不过是物欲放纵的最高形态。在那里，物质上的成功，而非道德的成就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的唯一标准——广告、信贷、艺术……社会中的一切都为刺激人类的物欲，满足人类的物欲而存在，而人的本性，生命需要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被严重忽略了。

^① 参阅雅虎 <http://tw.omg.yahoo.com/news/%E7%A7%91%E5%AD%B8%E5%AE%B6%E5%88%97%E6%9C%AB%E6%97%A5%E6%B8%85%E5%96%AE-%E6%9C%80%E5%A4%A7%E5%85%83%E5%87%B6%E4%BA%BA%E9%A1%9E-221045232.html>，访问日期 2013 年 9 月 18 日。



将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物质文明有机结合起来（代序）

当物质世界塑造了人，人也被物化了——从活生生的人变成了符号化的生产要素。

这种生活方式被称为先进、时髦、现代，但它却与人的本性相违背。因为人性清静，复归这种清静本性，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智慧、美德与快乐，人类若跌入“刺激物欲—满足物欲”的陷阱不能自拔，其结果只能是战争和毁灭。这不是耸人听闻的说教，两千多年前，儒家经典《礼记·乐记》中就曾明确指出这一点，上面说：

“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；惑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物至知（通智——笔者注）知，然后好恶形焉。好恶无节于内，知（通智——笔者注）诱于外，不能反躬，天理灭矣。夫物之感人无穷，而人之好恶无节，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。人化物也者，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。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，有淫泆作乱之事。是故，强者胁弱，众者暴寡，知（通智——笔者注）者诈愚，勇者苦怯，疾病不养，老幼孤独不得其所，此大乱之道也。”

人类清静的本性因为外物的刺激才起作用，形成善恶美丑诸观念。若人不能节制这种外物的刺激，最终将不断追求声色犬马，成为外物的奴隶，即上文所说的“人化物”、“灭天理而穷人欲”。于是人们就会互相欺骗，互相竞争，互相剥削，进而导致社会秩序的大乱。

读者诸君试想，这不就是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现实吗！竞争成为西方社会的基本美德，欺骗已经渗透入学术本身，剥削则在相当程度上国际化了，且多以金融这种温情脉脉的形式……

那么人类该如何正确地生活呢？就是遵循礼义之道。《礼记·乐记》的作者接着写道：“是故先王之制礼乐，人为之节，衰麻哭泣，所以节丧纪也；钟鼓干戚，所以和安乐也；昏姻冠笄，所以别男女也；射乡食



飨，所以正交接也。礼节民心，乐和民声，政以行之，刑以防之。礼乐刑政，四达而不悖，则王道备矣。”（文意：所以先王要制定礼乐，让人们有所节制。披麻戴孝的哭泣，是为了节制丧礼；钟鼓干戚的歌舞，是为了享受到适当的快乐；关于婚姻和冠笄的规定，是为了使男女有所区别；定期举行射箭比赛和宴会，是为了实现正当的社交活动。用礼来节制民众的心志，用乐调和民众的情感，通过政令使民众遵行礼乐，运用刑法防止违背礼乐的行为。礼、乐、刑、政，四者互相通达而不违逆，就具备了治理天下的王道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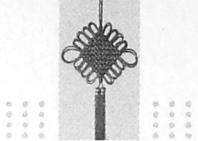
简而言之，就是通过礼乐来节制民心，使之不致为物所化，重归天性、天理——这是王道政治的基础，是礼、乐、刑、政的终极目标。

中国传统社会是用礼义之道来调节公私生活，维持正常社会秩序，传统西方社会则是用宗教达到同样的目的。然而在 21 世纪的今天，所有这一切都被物欲主义吞没了，物化的人类犹如一架没有灵魂的机器，它只能最终失控，自身毁灭。

在中国文化中，先贤称不遵循礼义之道的社会为夷——那不是一种文明的社会，而是一种野蛮的社会形态——与古代蛮夷相比，除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，西方文明与之有何区别！

二、“典型的欧洲痴呆症”

除了与人类本性相违背的生活方式，西方社会还流行一种有严重缺陷的世界观，即将世界截然两分，分为二元对立的两部分：或分为理念世界、现象世界，或分为人的世界、神的世界，或分为主观世界、客观



将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物质文明有机结合起来（代序）

世界。李约瑟称之为“典型的欧洲痴呆症”^①。

中国人整体的、有机的世界观在西方文明中一直欠缺。李约瑟总结道：依照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概念，宇宙是在自发的和谐之中，现象的规则性并不是来自外部的当权者，相反，自然、社会和天国中的这个和谐发源于这些过程中存在的平衡，这些过程是稳定的、互相依存的，并在非一致的和谐中彼此共鸣。^②

西方的世界观与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现实是相违背的，这会导致严重问题，具体表现为西方文明的排他性和狭隘性。

投射到国际政治领域，就是西方社会长期缺乏天下观念，地方、民族本位主义盛行，政治上始终没有实现大统一，也就不可能实现持久的和平。直到今天，西方大国仍然主要采取联邦制的组织形式。

而中国早在四千年前的大禹时代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的大统一。据记禹的功绩《尚书·禹贡》载，当时的礼乐之教“东渐于海，西被于流沙，朔南暨（从北方到南方——笔者注），声教讫于四海”，这里的四海也包括夷狄。《尔雅·释地》云：“九夷、八狄、七戎、六蛮谓之四海。”

当时维系天下秩序的不是西方排他性的殖民统治，而是包容性的“五服制”。《尚书·禹贡》描述说：

“五百里甸服。百里赋纳总，二百里纳铚，三百里纳秸服，四百里粟，五百里米。”（国都以外五百里叫做甸服。离国都最近的一百里缴纳

^① [比]普里戈金、斯唐热：《从混沌到有序：人与自然的新对话》，曾庆宏、沈小峰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39页。

^② [比]普里戈金、斯唐热：《从混沌到有序：人与自然的新对话》，曾庆宏、沈小峰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85页。



连秆的禾；二百里的，缴纳禾穗；三百里的，缴纳带稃的谷；四百里的缴纳粗米；五百里的缴纳精米。）

“五百里侯服。百里采，二百里男邦，三百里诸侯。”（甸服以外五百里是侯服。离甸服最近的一百里替天子服差役；二百里的，担任国家的差役；三百里的，担任侦察工作。）

“五百里绥服。三百里揆文教，二百里奋武卫。”（侯服以外五百里是绥服。三百里的，考虑推行天子的政教；二百里的，奋扬武威保卫天子。）

“五百里要服。三百里夷，二百里蔡。”（绥服以外五百里是要服。三百里的，要和平相处；二百里的，要遵守王法。）

“五百里荒服。三百里蛮，二百里流。”（要服以外五百里是荒服。三百里的，维持隶属关系；二百里的，进贡与否流动不定。）

西周祭（音 zhài）公谋父在谏穆王征犬戎时总结道：“夫先王之制，邦内甸服，邦外侯服，侯、卫宾服（此处《尚书·禹贡》为“绥服”——笔者注），蛮、夷要服，戎、狄荒服。”（《国语·周语上》）

祭公谋父还指出，欲维系天下的五服制，首先要“增修于德”，只有这样才能使“近无不听，远不服”。单凭武力是不行的，所谓：“先王耀德不观兵。夫兵戢而时动，动则威。”他接着说：“甸服者祭，侯服者祀，宾服者享，要服者贡，荒服者王。日祭、月祀、时享、岁贡、终王，先王之训也。有不祭则修意，有不祀则修言，有不享则修文，有不贡则修名，有不王则修德，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。于是乎有刑不祭，伐不祀，征不享，让不贡，告不王；于是乎有刑罚之辟，有攻伐之兵，有征讨之备，有威让之令，有文告之辞。布令陈辞而又不至，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，是以近无不听，远不服。”这段话的大意是说，属甸



将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物质文明有机结合起来（代序）

服的供日祭，属侯服的供月祀，属宾服的供时享，属要服的供岁贡，属荒服的有终生一朝王的义务。每天一次的祭、每月一次的祀、每季一次的享、每年一次的贡和一生一次的朝见天子之礼都是先王定下的规矩。如果甸服有不履行日祭义务的，天子就应内省自己的心志；侯服有不履行月祀义务的，天子就要检查自己的号令；宾服有不履行时享义务的，天子就要检查法律规章；要服有不履行岁贡义务的，天子就要检查名号尊卑；荒服有不履行朝见天子义务的，天子就要内省自己的德行，依次做了上述的内省检查后如还有不履行义务的才可以依法处置。因此，才有惩罚不祭、攻伐不祀、征讨不享、谴责不贡、告谕不朝的各种措施，才有惩罚的刑法、攻伐的军队、征讨的武备、谴责的严令、晓谕的文辞。如果颁布了法令、文告后还有不履行义务的，那就再一次内省自己的德行但不轻易劳民远征。正因为如此，近处的族群才没有不听从的，远处的族群也没有不信服的。

无论是生活方式，还是国际政治，中国文化皆以内省、内养为本，这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品格。表现为，其在国际政治上讲求协和万邦，反对侵略。所以中国版图数千年来的扩大，大体皆是由于抵御强敌，自然形成的，而非出于主动侵略。

西方政治品格与此相反，他们常常站在一己私利的基础上（比如为了石油资源），将对方说成异端，招集盟友，党同伐异，这是当代国际政治极其危险的主流——我们不得不警惕！

“典型的欧洲痴呆症”投射到学术领域，主要表现为西方学界随意以自己的标准衡量其他文明，只要与之不同，就会被加上传统、落后、异端的标签。19世纪是西方现代人文学术形成的时期，这种思想是殖民者的普遍心态，早已融入了西方学术的基因——后又被移植到中国



学林。

中国以礼乐教化节人欲，西方以宗教节人欲，二者并无高低之分，只有习俗不同，但在许多西方人眼里，缺乏宗教情怀的中国却成了他们拯救的异端民族。

中医与西医具有不同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，尽管有数千年的实践，仍被称为“不科学”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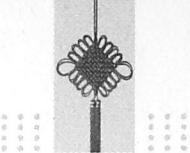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代表整体利益、中立的中央政府，因为限制利益集团和党争，就被称为东方专制或军政权独裁下的威权主义。这些词皆具贬义。

西方狭隘的学术观念，动不动就以科学自居，视其他学术范式为异端，与中国学问之道——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（语出《礼记·中庸》），其宽容性相差何止千里。

试看今日之中国，重经验知识积累的西式大学垄断一切，而重道德修养（尊德性，语出《礼记·中庸》）的中国教化不绝如缕。在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时代，电脑已经具备超强的信息存储和信息加工能力，以尊德性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学术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。因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注意到，人生修养比知识技能更为基础、重要！

三、西方无形的精神文化并不一定值得我们学习

“典型的欧洲痴呆症”投射到逻辑领域，就是两末之议在西方文化中盛行，其后果不仅浪费了大量人类智力资源，还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。什么是两末之议呢？就是在论述事理时采取西方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，取事物的两个极端展开论述，穷诸玄辩，远离中道。比如颜色，只



将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物质文明有机结合起来（代序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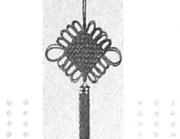
论黑白，而忽略宇宙间的五光十色；再比如政治，只论尧舜、桀纣两个极端典型，而忽视现实政治中诸多复杂的政治经济形态。《韩非子·难势》写道：“治，非使尧、舜也，则必使桀、纣乱之。此味非饴、蜜（饴糖和蜂蜜——笔者注）也，必苦菜、亭历（两种苦味的草本植物——笔者注）也。此则积辩累辞，离理失术，两未之议也，奚可以难夫道理之言乎哉？”

事实上，西方逻辑学有太大的局限性，其形式逻辑的最基础规律同一律本身就是有严重的问题，因为“甲是甲”或“甲等于甲”只有在排除了现实世界的时间性和历史性时，才是正确的，否则永远不可能成立——同样是一个人，幼年时他（她）和老年时的他（她）不可能定义为同一的。换言之，只有在时间与空间割裂的情况下，才能保证“在同一思维过程中，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概念和判断”。

这导致西方逻辑多适用于静态简单的事物，对于动态复杂的系统则难以适用——因为动态复杂的系统很难剥离时间一维。

中国古典逻辑名学不是这样，它特别强调概念的历时性，即“异时”。《墨子·大取篇》说：“昔者之虑也，非今日之虑也。昔者之爱人也，非今之爱人也。”（文意：过去考虑，不等于现在考虑。过去爱人，不等于现在爱人。）

《经下》说：“察诸其所然、未然者，说在于是推之。”《经说下》解释说：“‘尧善治’，自今察诸古也。自古察之今，则尧不能治也。”（文意：考察任一事物之所以如此，以及之所以不如此的原因，可以从“尧善治”这一命题推导出来；“尧善治”这一命题的得出，是从今天的情况出发，考察古代的情况，指尧善于治理古代；假如从古代的情况出发来考察今天的情况，就不能说“尧善治”，因为“尧善治”不是指



斯文在兹：中华文化的源与流

尧善于治理现代。)

《经下》说：“‘尧之义也’声于今而处于古，而异时，说在所义二。”《经说下》解释说：“‘尧之义也’，是声也于今，所义之实处于古。”（文意：“尧是仁义的”，是今天所说的话，这句话指的实际则处于古代，古代和现代是不同的时代，论证的理由是“尧是仁义的”这一命题涉及语言和现实两个方面；“尧是仁义的”这句话是今天说的，而“尧是仁义的”这句话所指的现实则是处于古代。）^①

关于名学与西方逻辑学的对比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拙著《正名：中国人的逻辑》^②，第8~10页。

西方逻辑过于不完备，特别容易陷入形式上完美自洽，本质上“积辩累辞，离理失术”的泥潭。也使建立于其上的学术理论常常远离现实，甚至直接成为西方国家攫取他国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——20世纪以来，这种情况越来越突出，尤其表现在政治、经济学领域。

西方有形的物质文明值得学习，并不意味着西方无形的精神文化也值得学习；中国科学物质上一时落后于西方，并不意味其他一切方面皆不如人。盲目学习他人，结果将是灾难性的。

著名历史学家张星烺（烺，音lǎng；1889~1951年）在1934年初版的《欧化东渐史》一书开篇就写道：“中国与欧洲文化，有形上及无形上，皆完全不同。上自政治组织，下至社会风俗，饮食起居，各自其数千年之历史辗转推演，而成今日之状态。东西文化孰为高下，诚不易言。但自中欧交通以来，欧洲文化逐渐敷布东土，犹之长江、黄河之

① 孙中原：《中国逻辑研究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06年，第618~619页。

②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。



将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物质文明有机结合起来（代序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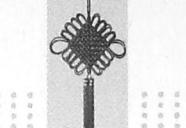
水，朝宗于海，自西东流，昼夜不息，使东方固有文化，日趋式微，而代以欧洲文化。则是西方文化，高于东方文化也。尤以有形之物质文明，中国与欧洲相去，何啻千里。不效法他人，必致亡国灭种。至若无形之思想文明，则以东西民族性不同，各国历史互异之故，行之西洋则有效，而行之中国则大乱。各种思想与主义，无非为解决民生问题。而勉强效颦他人，使国中发生数十年或数百年长期乱事，自相屠杀，血流漂杵，人烟断绝，以至国破种灭。吾人何贵乎效法此种主义耶？依此种情形观之，欧洲之无形文明，各种思想，各种主义，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者，是否优于中国固有，与夫是否有效法之必要，不能不使人怀疑矣。”^①

令人遗憾的是，20世纪如张星烺这样了解东西文明交流史，并理性看待此一问题的人毕竟是极少数。在国家危难，全盘西化的滔滔浪潮冲击之下，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精神逐步失去了自我。如何复兴中华文化，如何将之与西方物质文明有机结合，在科技力量迅猛发展的今天，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。

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对于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，还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命运，因为人类目前已经掌握太多自我毁灭的能力。

任重而道远，同志者——努力！

^① 张星烺：《欧化东渐史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1年，第3~4页。



目 录

目 录

根 源 篇

河图、洛书是一万至四千多年前的五行、四时太阳历图示，是中华文
化之根。这种上古中国先民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历法，其优美、简洁、
精确的理论构建令人惊叹。在数千年的应用过程中，河图、洛书所表征的
五行、四时历锁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、文化品格和科学范式，是中华民
族生生不息、绵绵不绝万年之久的文化基因，对于 21 世纪人类科学的进
步，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
第一章 河图、洛书图说考	2
一、图亡数存：北宋以前的河图、洛书	4
二、图现义乱：宋代以后的河图、洛书	9
三、河图图说：上古阴阳五行历概说	17
四、洛书图说：上古四时八节历概说	28
第二章 圣人则河图、洛书画八卦考	36
一、从阴阳观念到阴阳符号	37
二、从四时八节到四象八卦	46
三、从河洛数理到易经数理	52
第三章 银雀山汉简与河图、洛书五行四时历	57
一、《禁》篇揭示的五行本义	5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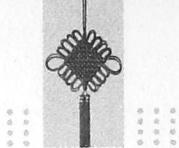


二、《三十时》当是齐地遗存的河图阴阳五行历	63
三、《迎四时》所见洛书四时八节历	67
四、《四时令》当为“五行令”	72
五、《五令》中隐含的五行生克关系	74

流 变 篇

从大历史的角度看，中国学术经历了五次大的变迁：从河图、洛书时代漫长的文化草创期到西周王官学的形成，一变也；东周礼崩乐坏，由王官学流变为诸子百家之学，二变也；战国、秦汉中国走向大一统，黄老之学集诸子百家之大成，三变也；汉以后，佛学大兴，道家流于道教，儒家通过改造吸收王官学、排斥诸子学逐步取得独尊地位，四变也；清末民初，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，西学取代儒学的独尊地位，中国本土学术不绝如缕，五变也——今天，我们复兴中华文明，主要是复兴集先秦诸子百家之大成的黄老之学。并在黄老之学的基础上，理智融会庞杂的西方文化——这是21世纪中国学人不得不面对的重大历史性课题。

第一章 重新评价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	78
一、儒家针对《尚书》“下刀子”	79
二、儒家拿礼、乐“戴帽子”	84
三、儒家以《易》、《春秋》“掺沙子”	89
第二章 黄老之学才是中华文化的主干	95
一、中国学人——迷途的文化羔羊	95
二、黄老之学——集诸子百家之大成	99
三、文明复兴——路漫漫其修远兮	104
第三章 黄老道统与儒家道统	107
一、黄老道统——中华文化的根柢	107



目 录

二、儒家道统——中华文化的异化	110
三、复兴中华道统、行人间大道	115
第四章 中国现代学术的兴起与西学的中国化	122
一、学术成为美国攫取中国核心利益的超级战略武器	122
二、中国本土学术被送入历史垃圾堆	128
三、移植西学过程中鄙名与伪名之灾	138

总 论 篇

中国古典学术相对于西方现代学术，具有精深、动态、统一的特点。从形式到内容，它都是统一的。从内容上讲，中国的知识系统分为两个互相贯通的层次。一是由道至名而至于法，分别由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学派组成，即道家、名家、法家，其集大成是兴盛于战国至西汉的黄老之学；二是儒家最高“密法”，性命与天道之学，它由孔子所传，子思氏之儒发扬光大，但孟子之后已经鲜为人知。性命与天道之学是由理至性而至于命，也就是《易经·说卦传》所言的“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”。

第一章 中国古典学术体系不是落后而是先进	146
一、重意象而轻抽象	147
二、重事变而轻言理	150
三、重统一而轻支离	155
第二章 中国有通天人之际的大学问	159
一、道、名、法三者的本质及其间的辩证关系	160
二、穷理、尽性、至于命，修养做功夫的三个步骤	166
第三章 中华文化在形式上一以贯之	171
一、名学与汉字同样基于意象思维	173
二、从名学的角度审视汉语语法单位分级	175